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 试论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在中国的回响

张 喆

(中南大学,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 斯大林为解决苏联各少数民族文化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套以“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理论。该理论在提出后不久便通过左翼知识分子的翻译和介绍传入中国,并且在抗战初期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被援引进左翼文艺界的话语系统。在此过程中,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在中国发生异变,形成更符合中国新文艺发展的“民族形式”理论。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对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加以吸收和改造,为其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22)02—0128—05

The National Form of Marxism: On the Echo of Stalin's National Culture Theory in China

ZHANG Zhe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e of various minor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Stalin proposed a set of national cultural theories centered on "national form and socialist content". The theory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left-wing intellectuals soon after it was put forward, and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left-wing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in the discussion of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this process, Stalin's theory of national culture changed in China, forming a "national form" theory that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and art. At the same time, Mao Zedong also absorbed and reformed Stalin's theory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provided references and references for him to construct Marxism Sinicization and new democratic cultural theory.

Key words: Stalin's Theory of National Cultur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National Form

1920年,斯大林为驳斥苏联在民族文化问题上存在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两种错误倾向,系统阐述了民族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具有“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著名论断。在斯大林看来,不同民族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应当依照各自民族的语言、文化、风俗等民族特征采取不同的表现形式,换言之,要以社会主义内容充实民族文化,以民族文化的形式表现社会主义的内容,从而使民族文化的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利益。斯大林的民族文化理论在中国的左翼政治文化领域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王元化先生曾指出,20世纪30年代末延安所号召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正是由“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口号衍化而来。^[1]然而,学界对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关注较少,^①对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进程中所发挥

的作用缺乏应有的估计。因此,本文通过考察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左翼对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的吸收与借鉴,探究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

一、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在中国的翻译与介绍

郑伯奇在《关于民族形式的意见》一文中指出:“民族形式这个名词的提出,大概是在苏联新宪法传入到中国前后”。^[2]有学者据此认为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是伴随着1937年“苏联新宪法”一起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指出《中苏文化》杂志上发表的《民族问题在苏联》《民族文化在苏联》《苏联新宪草之形成及其特质》等文介绍了斯大林有关民族文化的理论。但郑伯奇这句话的本义只是说明“民族形式”一语开始在中国被使用是在1937年前后,这并不代

著
海
民
族
研
究

收稿日期:2021—10—10

作者简介:张 喆(1994—),女,河南新乡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

表此时是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传入中国的时间点。据笔者目前所见材料可以判定,该理论介绍到中国的时间至少可追溯至十年前。

斯大林关于民族文化理论的表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文本中,分别是1925年斯大林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演讲《论东方民族大学政治任务》和1930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对这两个文本的翻译是国内获取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的重要途径之一。1927年,新青年社编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该书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革命和殖民地运动的文章,其中就有斯大林的《论东方民族大学政治任务》(新青年社将其译为《东方大学政治的任务》)一文。^②1932年9月,北平的《新地月刊》刊登《史达林论民族文化》的短文,其内容摘译自《论东方民族大学政治任务》。1938年至1940年间,斯大林的著作集相继被翻译成中文,其中中国出版社的《列宁主义问题》,解放社的《斯大林选集》,生活书店的《论民族问题》均收录有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的相关文献。1940年8月,戈宝权翻译汇编了斯大林讨论民族文化的12个片段,以《斯大林论民族文化》为题发表于《群众》第5卷第2期,译者突出强调了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重要观点。^③

除了文本的直接翻译外,学者们对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的介绍也使其得以在中国传播。1931年,曾到访过莫斯科的胡愈之发表了系列杂记——《莫斯科印象记》,其中《民族文化与国际文化》一篇涉及到斯大林的民族文化理论。文中对苏联的民族政策描述说:“布尔希维克在政治的立场上,是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而在文化及艺术的立场上,却又是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对于民族文化、民族语文、民族文艺,能像苏维埃政府那样地提倡保护。”然后进一步介绍了这种政策形成的过程和其依照的理论:“关于这民族文化的问题数年前党内的理论家间,也曾引起过剧烈的论争。尤其是左翼的理论家,反对提倡民族文化甚力,但终于斯大林的主张得了胜利。斯大林所持的理由,以为革命的最后目标,固然是创立世界的文化,以代替一切民族文化。但世界文化的产生至少要在世界革命成功了许多年之后。在目前的过渡的阶段内,无产者的政权,只限于苏维埃联邦的国境。这样创造世界文化显然是不可能。而且世界文化的创造,必须在各民族得平等自由发展其民族个性、民族文化以后。从各个自由发展的民族文化,混合结晶方能产出世界文化。”^④

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最初连载在《社会与教育》杂志上,后被新生命书局汇集成册出版。新生命书局在为此书撰写的广告中说道:“苏俄之在今日,恰如一个世界的迷,这样说时,《莫斯科印象记》便是对于这个难解的迷的解答……当其发表于《社会与教育》周刊时,尝为一般人最喜爱的读物,日本廿日会报会按期加以译述,其价值可知。”^⑤邹韬奋

也称赞道:此书系笔记体裁,“各则所述虽系零星杂感,但就所叙述的事实看来,处处流露努力于为民众谋经济上及教育上的建设精神”。^⑥此书在当时所受追捧的程度可见一斑,初步介绍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客观上推动了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事实上,胡愈之介绍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的文字曾一度引起议论和误解。茅盾认为这些误解是由胡愈之表述的偏差引起的,专门撰文澄清,强调苏联所拥护的民族文化必须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指出胡愈之“世界文化”一语欠妥,应代之以“社会主义文化”,且“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并不一定要在全世界各国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⑦胡愈之对此批评表示认可,并进一步分享了两段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民族文化的言论。这两段言论实际上代表了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的核心思想,其一是民族文化的阶级性,即“在民族资产阶级压迫下的民族文化……是以布尔乔亚为内容以民族为形式的文化,其目的在于拿民族主义的毒注入于群众而使资产阶级地位增强。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族文化……是以社会主义为内容,民族为形式的文化,其目的在于以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而使无产阶级的专政增强”;其二是以民族为形式,社会主义为内容的民族文化,能够在“无产阶级战胜全世界,社会主义变成一般生活方式的时期……自然地结合融化而成一种社会主义为形式内容的公共文化”。^⑧可见,30年代初,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已经受到国内知识分子的关注。

1936年至1937年,吴清友先后出版了《民族问题讲话》和《苏联民族问题读本》,这两本书是面对青年读者群体的通俗读本,其中都有对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的介绍。这一时期,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紧迫,“民族文化”在左翼文化界成为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一面旗帜。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迎合了国内这一情势,受到更多的肯定与赞许。袁孟超在《民族文化在苏联》一文中评价斯大林的民族文化理论“树立了社会主义体系的民族政策”,运用民族的形式来推行社会主义的实质,使得“文化建设中所发生的内容与形式的矛盾……统一起来,成为过渡时期中特有的民族文化”^⑨。焦敏之在《民族问题大纲》一书中也表达了对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的赞同,他申明:“在转型期间,我们赞同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因为要融合所有的民族文化而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唯一的大道!谁不了解转型期间的特征与矛盾,谁不了解历史过程的辩证形态,那么他对于社会主义一定要走上错误的道路”^⑩。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俨然被视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普遍准则。

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还得益于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共产国际向各支部传达要建立文化上的统一战线,注重发展民族文化的理念。季米特洛夫在大会的报告中讲道:“在每一个国家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都应当‘适应本地的气候’,以便在本地种下自己的深根”,无产阶级应当“为着拯救民族底文化,

使文化解脱日益腐化的垄断资本底桎梏、摆脱压迫人类文化的野蛮法西斯主义……使其成为真正人民的文化——形式是民族的而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文化”。^[11]这就意味着共产国际从官方层面向各国党支部推介斯大林的民族文化理论,希望各国能将其应用到各自的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去。1937年11月,延安《解放》杂志刊登《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一文,指出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生吞活剥的简单接受一个死东西,而是要把他种在自己土地上,使它适合中国的气候和营养条件”。^[12]与上述报告内容比照可以发现,这段有关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化的表述实际上直接受到季米特洛夫报告的启发。

总之,在1930年代,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已经通过翻译、介绍进入国人的视野之中,同时又借助共产国际七大在中共进一步得到推广。可以说,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多重途径,且在左翼文化界拥有相当广度的辐射与影响力。

二、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在中国的异变

通过梳理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在中国翻译与介绍的情况,我们可以知道,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在1930年代的中国对左翼知识分子而言已然是触手可及的公共知识。当时身在延安的冼星海还曾在日记中记录自己从图书馆借阅《民族问题讲话》一书^[13],说明即使在图书资源相对紧缺的延安,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一样得以传播。而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在中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1938年至1943年间左翼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民族形式”一语在中国的提起也正是发生在延安。

抗战初期,大众化成为文化运动和文艺工作的总原则,为实现文艺的大众化,不少学者主张利用大众所熟悉和喜爱的“旧形式”使新文艺真正接近大众、走进大众。茅盾在《关于大众文艺》一文中说道:“利用旧形式是现在抗战文艺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14]但是,有学者对于“旧形式”的利用持反对意见,认为利用“旧形式”会阻碍新文化的发展,是开历史的倒车。如艾青质疑道:“我们的文学革命已这么多年了,一开始,它就否定了旧形式,现在如果又把旧形式肯定了,将来不是又要重新来一次否定么?”^[15]在左翼文艺界对“旧形式”意见不一的情况下,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为利用“旧形式”的必要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1938年5月4日,《解放》刊登了《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一文,署名为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文章批评那些反对“旧形式”的学者是“不了解这种固有文化传统在民间习惯上的深厚影响,不了解应该怎样善于利用各种曲折的方式来改造固有文化传统,使之成为新时代的文化,不了解新内容旧形式在许多文化部门上对于最广大人民的教育,是具有怎么的重大的过渡的意义”。文章指出:“文化的新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是目前文化运动所最需要强调提出的问题……苏联各民族文化的伟大发展的经验,在这点上正是足资我们深刻的参考的”。^[16]5月25日,《新中华报》发表

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中讲到:“在苏联是以社会主义的强大内容来充实,运用发展联邦各民族之民族特质,民族形式的,经过实践,现在已经收到很优秀的成果了。在中国,无疑的,就要以抗战这一发展的强大内容。来利用我们民族大众中的旧的及比较新的,各种的民族大众的形式。这并非模仿公式,这实在是一个具体的真理”。^[17]之后,陈伯达也倡导文化工作者能够“理解到斯大林关于苏联文化发展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明论……根据自己民族所需要的文化运动,把这名论在实际中最广泛地具体运用起来”。^[18]

《解放》和《新中华报》都是中共在延安的机关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是边区文化运动总的领导机关,陈伯达又是延安深受重用的理论家,其言论足以代表延安官方的基本立场。因此由上述材料可知,斯大林有关苏联民族文化的政策受到了延安文化部门的肯定和重视,延安方面有意将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运用到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中来。但是,左翼文艺界并非照搬斯大林的民族文化理论,而是欲借用其理论表达自己对文艺路线的见解,因而该理论在中国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异变。

首先,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实际所要应对的是苏联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差异问题,即空间维度上的区域差异。然而因为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最初被援引进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话语之中,本就是为“旧形式”的合法性提供依据,所以在“民族形式”问题讨论初期,“民族形式”更多的被看作是“旧形式”,应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新文化之间冲突问题,即时间维度上的古今之别。因此,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传达的是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互为表里的理念,而以陈伯达为代表的支持利用“旧形式”发展新文化的学者借用这一理论,表达的却是传统与现代之间辩证统一的观点。这是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在中国的异变之一。

随着“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兴起和“民族形式”讨论的深入,时人对“民族形式”的解释与“中国化”趋同,逐渐衍化为对五四新文化“欧化”倾向的一个反思,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所讲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成为“民族形式”最权威的注脚。潘梓年说道:“我认为民族形式的问题,就是中国化问题。所谓民族形式就是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19]在这里,“民族形式”的意义与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一样,所揭示的都是文化的民族性和区域性。

不过,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的“民族”指的是苏联各少数民族,而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口中的“民族”指的是中华民族。黄芝冈坦言,苏联的“民族形式”和中国的“民族形式”是不同的,前者是“以各种不同的民族形式来表达社会主义的文艺内容”,使各民族“团结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而后者是基于抗日的要求,“第一是先使中原汉族从古旧的‘一盘散沙’进而为精神的、力量的伟大团结,因此,基于这‘抗日的内容’的要求,‘民族形式’便不当是分立的,独特的文艺形式而是指文艺的‘中国作风,中国

气派’而言”。^[20]可见,在抗战背景下,“民族形式”在一些学者那里流露出一种大汉族主义的情结,与斯大林所主张的各民族文化平等背道而驰。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中国‘民族形式’中的‘民族’,主要指的不是苏联‘民族形式’命题中的民族(nation),而是国族(state nation)”。^[21]这也是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在中国的异变之二。

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在中国的第三个异变是“民族形式”所承载的内容由“社会主义”变为“抗日”。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意在完成社会主义文化在苏联各民族的推广,其口号是“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内容”在抗日统一战线的背景下显然不合时宜,“抗日的内容”才是最符合需要也是最能够联合全国文化人的议题。萧三说道:“斯大林有名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那段说话是我们每个写作者,文化工作者的金科玉律。我们今天的文化文艺应该是‘抗日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文化文艺”。^[22]但是,以“抗日的内容”代替“社会主义的内容”,遮蔽了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对于文化阶级性的基本立场。斯大林所支持的是与社会主义文化相契合,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民族文化,这一原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被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有意忽略,侧面反映出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在面对民族危机时在阶级问题上的无奈让步。蒋天佐曾批评当时讨论“民族形式”问题的文章都没有从阶级立场考察“民族形式”,“他们钻进了幻想的全民族划一不二的‘民族形式’的牛角尖里,忘记了苏联的活生生的例子,忘记了可以有而且应该有一条阶级内容的生命线贯穿着多样的民族形式”。^[23]

总而言之,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在文艺大众化的语境中进入左翼文艺理论的话语系统,并为“旧形式”在新文化发展中占据合法地位提供理论支持。“民族形式”一语从指代“旧形式”到成为“中国化”的同义语,虽然套用了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的外壳,但其具体内涵已与苏联不同,更符合中国民族解放和文艺发展的实际诉求,成为抗战时期左翼文艺发展的总路线。

三、毛泽东对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的吸收与改造

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作为一种文艺理论被左翼文艺界接纳和使用的同时,也被毛泽东拿来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使用了“民族形式”的概念,称:“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24]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提出“民族形式”概念是直接受到陈伯达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是通过

当时的期刊和书籍自主摄取这一理论资源。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毛泽东曾经系统学习过斯大林的民族文化理论,但是从他的阅读书目中不难发现,至迟在1938年年初,毛泽东已经通过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对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有所了解。李达在其《社会学大纲》中论述社会主义社会新文化的创造时,阐述了“普罗列达里亚文化的国际的内容与其民族的形式的问题”:“普罗列达里亚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决不是没有民族形式的文化。普罗列达里亚文化,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民族中,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和表现方法。‘普罗列达里亚文化,不但没有废除民族文化,反而给它以内容;同时,民族文化,也没有废除普罗列达里亚文化,反而给它以形式’。所以‘苏联普罗列达里亚的专政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是民族文化(从内容上说是社会主义的,从形式上说是民族的)的繁荣期’。只有在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地盘上,才能产出一般人类的文化”。^[25]

这实际上就是对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的概述。毛泽东对此书十分推崇,不仅在自己的读书日记中记录了阅读此书的进度,还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自己已经读了十遍《社会学大纲》,希望将此书推荐给其他干部们读。^[26]仔细分析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的用语,我们可以发现“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与李达书中“国际的内容与其民族的形式”的表述极为接近,而通常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在中文里所流行的用语是“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或许毛泽东使用“民族形式”概念是受到了《社会学大纲》的影响。

石凤珍认为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对“民族形式”术语的运用与斯大林的本义一致^[27],笔者认为此说有些偏颇。尽管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使用了“民族形式”的概念,但其传达的理念却与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是有差别的。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的提出主要着眼于无产阶级文化如何在欠发达的民族中得以普及和推广,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议题。而毛泽东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落脚点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宣传的民族化,使马克思主义能够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现实化、具体化。换言之,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问题,毛泽东更关心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得以实践。在这里,毛泽东是借用“民族形式”打破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教条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事实上,更接近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本义的是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再次使用“民族形式”概念。他在大会中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称“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28]在这里,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套用“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公式,是因为斯

大林民族文化理论把文化中具有民族性的元素被冠之以“民族形式”，使得民族文化的继承不影响社会主义文化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背景之下，中共需要缓和国际主义至上的态度，用民族元素装点作为西学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更好的适应中国的土壤。在此情形下，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恰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消解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矛盾、阐发文化的民族性提供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也以此申明自己并非民族虚无主义者，而是民族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相较于左翼文艺界提出的“抗日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显然更符合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对民族文化阶级性的规定。斯大林曾对不同社会制度下民族文化的性质加以区别，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民族文化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的民族文化其实质则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下，民族文化才是一切劳动者共同的文化，也就是社会主义文化。李平心曾强调：“形式与内容底矛盾的统一，而使形式从属于内容。所以在中国目前的环境里，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该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民族文化主要依然是作为‘民族形式’的运用而被提出来的”。^[29]既然民族文化只是作为“民族形式”被运用，那么它相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而言就处于从属地位。也就是说，只有在在不违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提下，民族文化才能够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正如吕振羽所说，民族文化“只能在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政治服务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去批判地继承，必须经过改造，消化为属于社会主义文化范畴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成因素”。^[30]

综上所述，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于1920至1930年代通过左翼知识分子的翻译、介绍以及共产国际向各支部的推介传播至中国。抗战初期，在左翼文艺界对利用“旧形式”问题产生争论的语境下，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被拿来为“旧形式”的利用提供理论依据。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形式”的内涵发生异变，被塑造为更加贴切中国新文艺的创作法则，进而代替“旧形式”成为讨论文艺大众化、中国化理论最流行的用语。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对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加以吸收和改造，并以此为理论工具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他一方面利用“民族形式”概念批判教条主义，阐发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现实化的主张；另一方面将“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作为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参照，使中共在接受民族文化传统方面有一个正确的尺度。因此，斯大林民族文化理论理应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来理论资源，它在中共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应当被合理的估计。

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理渊源的若干考证》(《现代哲学》2012年第2期)，颜芳的《中苏文艺理论中的“民族形式”辨析》(《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9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张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1921—1945)》(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②1930年唐杰主编的《民族革命原理》和1938年李铁冰主编的《论民族革命问题》同样收录了此文。对照新青年社的翻译版本，可以发现唐版和李版的译文均直接来源于新青年社的版本。

参考文献：

- [1]王元化.传统资源：具体中的普遍性[A]//王元化文论选[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 [2]郑伯奇.关于民族形式的意见[J].抗战文艺，1940，(3).
- [3]戈宝权.斯大林论民族文化[J].群众，1940，(2).
- [4]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九)[J].社会与教育，1931，(3).
- [5]苏俄访问记[M].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
- [6]韬奋.读《莫斯科印象记》[J].生活，1931，(40).
- [7]朱寰(茅盾).谈谈民族文化[J].社会与教育，1931，(9).
- [8]胡愈之.再谈谈民族文化[J].社会与教育，1931，(10).
- [9]袁孟超.民族文化在苏联[J].中苏文化杂志，1937，(6).
- [10]焦敏之.民族问题大纲[M].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
- [11][苏]季米特洛夫.反战反法西斯斗争的当前问题[M].汉口：中国出版社，1938.
- [12]从贤.现阶段的文化运动[J].解放，1937，(23).
- [13]冼星海全集(第1卷)[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 [14]茅盾.关于大众文艺[N].新华日报，1938—02—03.
- [15]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座谈会记录[J].七月，1938，(1).
- [16]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J].解放，1938，(39).
- [17]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N].新中华报，1938—05—25.
- [18]陈伯达.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J].解放，1938，(46).
- [19]潘梓年.论文艺的民族形式[J].文学月报，1940，(2).
- [20]黄芝冈.论民族形式[J].抗战文艺，1940，(1).
- [21]颜芳.中苏文艺理论中的“民族形式”辨析[A]//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9辑)[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 [22]萧三.论诗歌的民族形式[J].文艺战线，1939，(5).
- [23]蒋天佐.论民族形式与阶级形式[J].奔流文艺丛刊，1941，(1).
- [24]毛泽东.论新阶段[J].解放，1938，(57).
- [25]李达.社会学大纲[M].上海：笔耕堂书店，1937.
- [26]陈晋.毛泽东阅读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27]石凤珍.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J].解放，1940.
- [29]庄师宗(李平心).关于民族文化问题[J].求知文丛，1941，(11).
- [30]吕振羽.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中国社会史诸问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注释：

①目前对此问题有所讨论的有石凤珍的《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李建勇、任颖危的《“马

[责任编辑 杨虎得]

[责任校对 端知加]